

譯者序

我2009年在《南方都市報》實習，瞧見攝影專欄有一組非洲人在廣州生活的照片，雖然我從小在廣州長大，卻沒遇到過這些人，心想原來廣州已經有點紐約的樣貌了啊？麥高登教授當時是我的人類學導師，他研究的香港重慶大廈中有不少來自非洲和中東的商人，很多這些商人正是來廣州和義烏等地採購；因此鼓勵我嘗試接觸駐紮在廣州的這批外國人。兩年多的田野考察中，我在廣州火車站周邊的廣園西和小北一帶，認識了來自尼日利亞、加納、剛果、肯尼亞、坦桑尼亞、塞內加爾等非洲國家來的商人，後來和老師麥高登、同窗林丹一起又訪問了不少做中非貿易的商鋪。研究初期，我總有出了國門的幻覺，因為經常出入異域風味餐廳、非洲人做生意的商鋪、英文彌撒的教堂，吃的也總是木薯麵團蘸燉肉醬、扁豆湯、或烤肉配中東炒飯。一兩個月後新鮮感消失殆盡，我才開始看見這些地方是非洲人和中東人實實在在生活工作的尋常地點，甚至對他們來說是家一般的地方，我們這些研究者一進去反而有點格格不入，因為基本上很少有中國人和美國人造訪那裏。而一旦放下獵奇心態，我們研究者才開始踏出試着理解甚至融入這些社群的第一步。

我很感謝遇見的受訪者，不僅是來自非洲和中東的商人和中介，也包括向我們傾訴的中國同胞，也謝謝麥高登教授的引導和林丹的幫

忙。最後，我想謝謝母親張望英和父親楊凱旋，多年來支持我進行研究，並且作為我譯稿的最初讀者給了很多好建議。

楊瑒

2018年3月

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